

抗疫诗文更需情、识、思兼备

◎常耀宗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,诚如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。就拿目前的抗疫诗文来说,下可关注个体所为,中可关注群体动态,上可关注整个社会趋势,从抗疫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全国上下众志成城、共抗疫情的精神风貌,抗疫诗文凝聚起了全国人民坚如磐石的抗疫精神力量。但是,如果我们稍加留意,就会发现,有些抗疫作品并不完美,存在虚、俗等问题。在我看来,抗疫诗文需要凸显以下三个要点:

一曰情。文学离不开生活。只有把自己摆进去了,切实感受抗疫中的人和事,发现真善美,你从中感动了,然后才能感动他人,这就叫以情动人或让人动情。“但如何提高诗文书写的质量,将情写大、写广、写深,并在情中注入慧心与天地万物之性灵,并不是每个诗文书写者都能做到和意识到的。倘能将对他人的挚爱与指向自我的性情抒发统一起来,这样的诗文自然便是一种高格的诗文书写,是一种和谐澄明的诗文书写。”(陈剑晖《光明日报》)

比如,丰建国发表在内蒙古丰镇市文联公众号上的抒情诗《你们也是可敬的逆行者》,可谓真挚动人,情深意长。它以“昨夜寒风袭人……我猛然想起了你们/仍在街巷、小区/还有村口、路边/经受寒风冷雪敲打”入题,随之由远及近,以小见大,写到钟南山、医护人员、子弟兵,说他们以坚守逆行在防控路上。最后诗人写道:“风,你去歇歇吧……天快亮吧……我双手合一,泪花点点/愿时艰共克,灾情早除/让所有逆行者早早回家……”。全诗构思精巧,虚实结合,情到深处歌自出,真诚地抒发了诗人对全国疫情防控人员的由衷敬佩、感激、赞美之情,让我们见证了新时代谁是抗疫最美的形象、最强的力量。

这首诗虽然直接抒情,但诗人巧妙地设计了一个寒风袭人的图景,它既指现实中的风,又暗喻新冠肺炎。通过逆行者们的抵抗,象征性地诠释了他们坚守的艰辛、尽职尽责的意义,这就避免了直抒胸臆可能带来的直白、浅露,“自有一种宅心仁厚笼罩着的大爱渗透其间,加之作者是以自己的心贴着人物的心来写,因而自有一股感情和伦理的力量吸引着读者。”(陈剑晖《光明日报》)一句话,至诚则深情。

我们看作家刘醒龙发表在《文艺报》上的散文《问世间情为何物》,写的是作家身处武汉疫区,在全国医用防护物资都紧缺的情况下,他却收到外地作家们快速递来的口罩、护眼镜、防护服,委婉解决了疫区一些人的燃眉之急。对此,作家心存感激。文章自始至终都在讲一个“情”字,彰显了天地有情皆大爱的浩然正气,具有人性之美、人生之趣的开阔意境。文末,作家说:“封城之下的武汉正如一艘大船,这船上的个人,即便没有可以划水的浆,危难之际,在自己的位置上,往风帆上吹一口气以助力前行,都是一种壮举。问世间情为何物,直教人生死相许。天大的事情也终究是要过去的,留在天地间,只有这非物质的人与人互爱互助的永恒之情!”显然,这是作家深化升华了的真情流露,明着说患难见真情,真情贵及时,如雨润人心,却暗指人生身外之物都是过眼云烟,唯有真情才是维系社会的桥梁纽带、才是最值得珍惜的人文滋养。通读此文,我们深感其情中有理、理中含情、情理交融、意趣横生。

综上所述,情是诗之本,情之所至才能出手不凡。情贵在深化,唯情才能赢得读者的心灵。

二曰识。文学是个体的反映。这个反映也是有角度、有见识、有创造的。同一个题材的诗文书写,最忌千篇一律、人云亦云,甚喜与众不同、真知灼见。由此,创作讲究谋篇布局,讲究辟蹊径找准与时代

对接的维度,这样方可实现文学功用性与审美性的有机统一。

例如,李鲁平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散文《辗转的春天》,就是一篇慧眼识珠的好文。文章分别叙述了一个基层干部和一位女护士,他们为了防疫历尽艰辛辗转了好几个地方,跋涉了几百、上千公里路程终于回到各自岗位的故事,真切反映了危难时期他们爱岗敬业、舍小家为大家的高尚情怀,他们无疑是抗疫一线无数无名英雄中的一个缩影。

也许该文讲述的故事很平常,但它平中见奇,奇就奇在作家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到不平常的素材突破口,予以重新创造。这个故事,展示出了抗疫时期每个人通往春天的路程都是极不平凡的,通过这个故事,让我们看清了这个时代总有一些人,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的人性,也让我们领略了沉甸甸的厚重人生。

同样,李瑾发表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散文《一个防疫一线村支书的春节》,也是篇颇有新意的佳作,令人眼前一亮。通常,我们写抗疫文章大多侧重具体事件,以事来突出人物形象。然而李瑾没有随俗,他抓住“忙”这个文眼,写了村支书忙开会、忙播音、忙贴标语、忙摸排,唯一的一次忙私事就是“贴春联”,结果还没贴完就去了镇里,连回家吃饭也常常是忙的吃了一半就走了……

透过村支书的忙,我们可以想象疫情时期社会各个层级的忙,由此,忙无形中成了防疫时期鲜明的特征。那么,李瑾弘扬的何尝不是时代的主旋律?发出的何尝不是时代最强音?

没有规矩不成方圆。书本长知识,社会增阅历,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形成自己的见识,功夫更在诗文书外。

三曰思。思,既是不可或缺的境界,也是无声胜有声的留白。文学作为语言艺术,它所蕴含的思想往往较其他艺术更深入。它除了给我们情绪的感染外,还能给我们以大量的、强烈的、深刻的理性认识。

譬如,宫亦鸣发表在巴彦淖尔市文联公众号上的长诗《这就是中国》,站位高远,气势磅礴,由远及近,由近及远,由国到家,由家到国,远近结合,全面、真实、细致地展现了全民抗疫、共克时艰的中国气象。这首诗深化了抗疫时期中国精神的内在价值,充分显示出诗人的爱国主义思想境界。全诗句句写实,却句句抒情,读来回肠荡气而又温情似水,感人至深而又颇受启迪,为抗疫诗歌格局标示出一个新高度,值得大家借鉴。

文学蕴含着深刻的思想性,突出地表现在语言最为凝练的诗里。又如,鲁若迪基刊登在《光明日报》上的短诗《体温表》:

“这个时候/测量着的/不仅仅是人的体温。”全诗虽然仅3行16个字,可是它给读者留下的想象空间、参与空间是丰盈的、无限的。让人联想到抗疫时期,测量的不仅仅是人的体温,而是责任、担当;是守护、热爱;是健康、生命……该诗的特点是以少胜多,不尽之意于言外,启人联想,动人心弦。

思是诗之魂,思既在诗之内,又在诗之外。

抗疫诗文只有情、识、思三者兼备,读者才不会只是被动的接受者,而是积极的参与者,“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”,作者与读者融为一体,如此诗文的审美价值也就实现了。



于雪梅 摄

文学是对存在的勘测

——李明诗集《风吹大地》读后

◎李悦

李明写诗已有34年了,他还在写。最近,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诗集《风吹大地》是他的最新诗集,从这本诗集中,我们读到了李明的进步,我们高兴地看到:不再有刻板印象,不再有风花雪月,不再有华辞丽藻;不再是自我宣泄,不再是宣传工具,不再是惯性思维,不再是消费文化……

李明构造了他个人的独特世界,他的世界核心是他个人的、内在的、独一无二的个性的声音,具体表现在一个多层次的诗学结构中,包括:形式、结构、语汇、句法、意象、语气、视角等。这个复杂的结构即是诗的本体。

诗集《风吹大地》中有一首诗,题目是《高处》,全诗只有四句:房子是泥土的高处/烟囱是房子的高处/炊烟飘起来了/它是日子的高处。

我们经常在一些诗里看到房子、烟囱、炊烟,但是没有看到“日子的高处”,而这些是属于李明的,他用语言把个人经验转化成普遍经验,启发和感动了读者。李明对语言有着敏感性,这是诗人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,当然也是诗歌读者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。

诗应该是一种对语言的全面体会和感应,它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传达信息的工具和媒介。它的物质性和意义表述构成相辅相成的有机体,李明能够把文字的声音、造型、组成元素及结构服务于他

想表达的主题,做到形式与内容的一体化。

这本诗集中有许多诗所表达的个人经验直指人存在的真相,例如《平安》写到:一只蚂蚁在行人路上跑着/奔跑的速度让我吃惊/幸好此时路上无人/蚂蚁的小心是多余的/前面就是杂草丛了/蚂蚁一拐弯/我就看不见它了 整个过程多么短暂/又是那么漫长。

这首诗让读者离开蚂蚁,想到人自身存在的短暂,而且这短暂的时间的速度又是那么飞快。人,原来是如此活着,如此存在着。诗人的诗只有在关注人的存在时才能与读者的内心相关联,诗比其他艺术形式更能简洁明了地引导读者进入自我的世界,并在那个世界里探寻人生与世界的意义。正如米兰·昆德拉所说的:“文学是对存在的勘测”。

李明能够自觉地去完成文学的任务,《风吹大地》也就比他以往的诗集提升了格调。

李明的诗越写越明白。



本报记者 许素红 摄

多一点“咬文嚼字”精神

◎万冈歌

记者从语言文字期刊《咬文嚼字》编辑部获悉,著名语言学家、出版人郝铭鉴于4月2日病逝。(4月3日《大众日报》)

提起郝铭鉴,很多人耳熟能详,他不仅是一位资深出版人、总编辑,还于1995年创办了著名的《咬文嚼字》杂志,并因此成为读者十分熟悉和喜爱的“捍卫语言文字纯洁性”的专家。谈及《咬文嚼字》这本小刊物的缘起,郝铭鉴曾说:“刊物虽小,但语法规则‘兹事体大’。它不仅关系到信息传递的质量,关系到城市的文明程度,而且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。我想,这应该成为我们办刊的立足点。我们办的是小从刊,但需要的是大眼光。”

是的,《咬文嚼字》作为读者心中的“语林啄木鸟”,多年来一直坚持独特的办刊风格,如低价、小型、严谨、较真等,为中国出版界和语言文字界留下了宝贵财富。尤其是,从2006年起,每年都要对外发布年度“十大语文差错”,一直坚持到现在,这种“咬住差错不放松”的钉子精神和持之以恒精神广受赞誉。

《咬文嚼字》评选年度“十大语文差错”的目的,一是为了开设“语文大课堂”,用“蚂蚁搬家”的方式,减少语文差错;二是为了唤醒社会对母语的敬畏之心,激发民众准确、规范使用母语的自觉。因此,它不仅力求做到权威,而且很有针对性,对于唤起人们重视规范用语,避免不必要的错误,发挥了很好的帮助作用。很多用语错误,完全是常识性的错误,或许根本就不该发生,比如“一篮子货币”误为“一揽子货币”;“黏豆包”误为“粘豆包”;“绅士”误为“绅仕”;“作为”误为“做为”;“脱离欧盟”误为“脱离欧洲”等,便都属于这种情况,只要平时稍加注意,并非可以避免。

《咬文嚼字》每次评选年度“十大语文差错”,不仅态度严谨,而且程序规范,先后经历“条目征集”“条目筛选”“专家审核”“征求意见”“最后审定”等步骤,可见多么用心,多么努力。近年来不少电视台推出了“汉字听写”“成语竞赛”等字词类节目,在传承文化、传播知识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。有很多观众、网友便提出,这样的节目不能只为了眼前的收视率竞争,而应长期办下去。可见,《咬文嚼字》长期坚持评

选年度“十大语文差错”的做法是多么的有眼光,有毅力!

多年来,《咬文嚼字》通过每年公布“十大语文差错”,达到了激发民众准确、规范使用母语的自觉,减少语文差错这样的目的。比如第一年发布的“十大差错”中有把“神舟六号”误成“神州六号”一条,后来提到我国航天飞船时,媒体基本上很少出现“神舟”误成“神州”的差错了。具体到个人,很多人也通过年年阅读“十大语文差错”,更加深了对某些词语的理解,也很少再说错、用错了。如果不是《咬文嚼字》的引导,很多词语的含义、来历、用法等,我们还真知之甚少,甚至稀里糊涂。

除此以外,《咬文嚼字》还从2012年起,每年年底公布一次年度“十大流行语”,并始终坚持“流行、创新、文明”的三大评选原则,在积极拥抱新潮流的同时,也警惕社会语态生态的粗鄙化。由此可见,郝铭鉴对汉字是多么的敬畏。

如今,郝铭鉴虽然不幸离我们而去,但其倡导的理念及蕴含的精神,却会一直存在下去,永远激励着我们在“捍卫语言文字纯洁性”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由此想到,作为各类媒体,在缅怀郝铭鉴的同时,能否也针对自身容易出现用语差错,认真进行“咬文嚼字”呢?如果能专门开辟“勘误”栏目,长期坚持自我纠错,无疑就更好了。多数媒体曾经都这么做过,对于读者指出或自身发现的用语错误,会及时进行声明和纠正。如果今后能这么做,经常性勘误,那么,一定会大大减少用语错误。

继而又想到,作为政府部门,同样应该学习郝铭鉴及《咬文嚼字》的“钉子”精神,不仅对各项工作都要做到精益求精,对于文字工作更要层层把关,避免出差错。而事实上,各级政府部门由于文字差错导致公众不满,甚至被严厉批评的现象,时有发生。

